

粤桂两地客家的源流

■ 王 戈

粤桂客家，是中原汉族南迁移民与岭南广东、广西两地的土著居民长期互动、磨合与重组而形成的汉族新民系。其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特征，历史上受到中原和闽粤赣桂四地土著居民的影响。粤桂客家文化，属多元文化的融合体，内部因地域不同而略有差异。它既有中原文化的特征，也有岭南文化的特征。

岭南粤桂，古属百越之地。这两地的土著居民的称谓，一般而言，秦汉称为西瓯（西呕）、骆越（雒越、瓯越），后称乌浒（乌浒蛮、乌武蛮）。魏晋隋唐宋时期，称“俚僚（僚）”、“蛮”（土人）、“蜑”（有“蜑、蛮蜑、夷蜑、蜑人”等称）等。自宋代起至明清，称谓有“僮”（有“儿僮、撞、侬、徕”等称）、“俚僚”（到明清，“俚僚、土人、蛮、徕”等称谓，都已统一在“僮”这个族称而消失）、“蜒”（“蜑”的延伸，有“昼人、鱼蜒、珠蜒、昼民”等称）、畲（在闽粤赣边界）、黎、“徭”（瑶、徭）、苗等称谓。僮族，于1965年才改为壮族。秦汉时期，中原客家先民已进入岭南地区，晋唐时期，一些移民先辗转在闽、赣等地，后又辗转迁入两广地区。宋元时期粤桂客家人，已形成一定的规模。明清两朝，是粤桂客家快速成长壮大的时期，很多民系特征已相对固化。

一、六次大迁徙，孕育粤桂客家的形成与发展

粤桂客家的形成和发展，主要体现在约有6次客家人艰苦辗转的大迁徙中。

第一次大迁徙在秦汉时期。秦朝曾先后派两批约百万军人“戍五岭”，秦亡后，这两批军人均留在了岭南。此外，秦朝还迁徙50万民众到岭南“与越杂处”，这是强迫性的大迁徙。这些戍边和迁徙的军民，成了首批岭南客家先民。两汉时期，在平南越、讨二征之后，汉朝廷也曾派遣部分士兵，在岭南粤桂两地与越杂处，开发戍边。据史料载：秦始皇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，秦军60万灭楚南征百越，从闽粤赣边境进入揭岭，直抵广东的兴宁、海丰等县界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还采取多项措施改善水陆交通和巩固政权，如修驰道、大移民等。在大移民中，秦始皇“又发五十万人守五岭，与土著杂居”，并“在中原地区征调一万五千名未婚女子前来岭南”，为士卒补衣，充当将士的妻子，还“从中原迁徙五十万各行各业的人到岭南，‘与越杂处’”。《合浦县志》也曾载：“公元前223年，秦平定南越后……当时大批移民（主要是中原汉人）南迁县境”。秦始皇平定南越后，他将百多万中原军民“与越杂处”，通婚繁衍。这是岭南古越族土著居民，与中原汉族居民共同生活的开始。这批移入的中原汉族居民，成为岭南的首批客家先民，开始了岭南的民族大融合。据说，到“秦始皇三十六年，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边徙民，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”。这为汉文化渗透岭南，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汉化和民族大融合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在两汉时期，也有两次较大的中原汉人迁移粤桂。一是公元前112年秋，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，征集“楼船十万人，水陆并进，会至合浦，征西瓯”，并留下部分军人戍边定居。二是在东汉时期，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于东汉建武年间（25-57年）率两万余兵，平息交趾征侧征贰叛乱后，“也留下部分军队在此（合浦）戍边”，帮助岭南发展生产。后人称这批军人为“马留人”，他们所说的话称为“马留话”。“马留人”的子孙，有些被其他民系同化了，

但其方言（“马留话”即廉州话）还有幸得以传承。现在北海、湛江、钦州、防城等市，都有“马留人”“马留话”的传闻。

民国《钦县县志》载：“居留于钦，以黄姓人从马伏波来者为最久，繁衍钦属，多称纯旺后裔。”据台湾出版的《何日珠还话合浦》一书载：“廉州话之来源，据说东汉时马援率师讨南越两征之乱，往返俱经合浦，士兵流落合浦所操之语流传下来，故又称马留话。马留又讹称麻佬，故有麻佬话之别称。”现说廉州话的人约有120万，尤以合浦人为多，这是客家先民留下的一种特色方言。

此外，两汉时期，还有一批汉人、谪臣被流放至廉州、高州、雷州等地。

第二次大迁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。主要是因战乱。居于我国山西、甘肃、陕西等西部地区的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等少数游牧民族，与汉族同属中国人。他们不满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极端歧视与虐待，燃起对汉族地主的仇恨，结果各族间相互仇杀，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。据《中国通史》载：“关中自晋惠帝时起，屡遭战祸，人民流亡，土地荒芜。三一一年，刘曜攻陷长安。当时关中连年饥荒，尸骨遍地，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。”因此，中原山西、河南的大批汉人，为避战乱而南迁，一部分人远涉辗转，迁徙到江西、安徽等处。稍后，约有96万中原居民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两岸，远迁的到闽粤赣边区，再“远者，且入于今日广西的东部”。此外，也有迁往桂南钦州的。据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·五民》载：“钦民有五种，一曰土人，自昔骆越种类也，居于村落……二曰北人，语言平易，而杂以南音，本西北流民，自五代之乱，占籍于钦者也……”又据民国《钦县县志》载：“五代之乱，外来华族，占籍于钦者，亦想不少。”从以上文献记载可见，在五代“五胡乱华”时期，已有不少中原汉人（所谓“北人”和“外来华族”）迁徙到钦州地区，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而居。

第三次大迁徙在唐末五代时期。黄巢起义战乱，逼使大批中原汉民南迁。在唐朝中期，安禄山、史思明发动叛乱，此后，一连串的反叛讨叛的战争不断。唐后期，宦官掌权，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，以及以藩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，进行长期的战斗，人民受尽战争、压迫之苦。黄巢、王仙芝等民众被逼发动起义。唐亡后，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，呈现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。大批的中原汉民被逼逃到交通不便，山高林密，但较为安全稳定的闽粤赣边区，有少部分迁徙入粤北的南雄、韶关和粤东的梅州、惠州等地。此外，“自唐、宋、元、明各代起”，还有“一批批福建莆田等地人民，循海路迁入雷州半岛”。

第四次大迁徙在宋末元初时期。北宋后期，权贵腐败无能，重用投降派，在辽、西夏和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下，一味求和、送礼甚至撤防割地。后来，北方民族女真人日益强大，建金灭辽。进而北宋灭亡，国都南迁。金人和元人的南侵，使中原生灵涂炭，大批民众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，以及迁往较为安全稳定的闽粤赣桂地区，加上唐宋时期在南方百越地区推行“毋赋税”政策，所以，闽粤赣桂地区有凝聚效应，有效吸引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。

南宋时期，北方蒙古族日益强大，元帝国大举灭金灭宋。宋末爱国将领文天祥领导客家人抗元失败后，为逃避元军的追捕株连，大批原迁住闽赣边区的客民，又举家迁徙到梅州、惠州、雷州、廉州、容州等两广地区。这有不少史料可证实，如《合浦县志》载：“靖康以后，北宋覆亡，有随赵构南渡，或随南明王朝南迁而来落户者。此外，还有不少官宦贬谪至县境。”这说明在宋末元初至明末，已有不少中原汉民迁徙至合浦，其中也有不少客家人。广东省海康县（今雷州市）

曾重点调查 18 个乡镇，据统计：“从来源上看，有 90% 以上的族姓是从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和福州府福清县迁来的移民……迁徙移民的集中期在宋末，明朝最多，其次是清初。”这也说明在宋末元初至明清，都有很多客家人从福建莆田等地，乘船到广东雷州等地落户。

第五次大迁徙在明末清初时期。大迁徙的主要原因，一是战乱灾祸，二是内政治理。

在因灾祸战乱迁徙方面，明末天启、崇祯年间，由于明皇室和大官僚大地主进行土地兼并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日益苛重，而最高统治者又通过“辽饷”“剿饷”等名目，横征暴敛，使人民倾家荡产，到处流亡，加之水、旱、疾疫等灾害不断发生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，从而引起明末如火如荼的农民大起义。李自成领导的几十万起义军，从陕西打到北京，波及几个省。中原民众在战乱和天灾人祸的逼迫下，大批南迁到闽粤赣桂等地。此外，原属我国北方的女真部落建立清王朝后，清朝贵族入关与汉族大地主联合镇压明末的农民起义。明末反清复明军失败后，为躲避清军的追捕株连，逃亡的起义军和反清复明军，只好举家往粤桂迁徙，有些甚至迁到海南岛和台湾岛。这属政治性的迁徙。

在因内政治理迁徙方面，明清两朝都曾有为戍边屯田、开山垦荒等需要鼓励开垦的政策。将地少人多、自然资源枯竭、人口膨胀的粤东、粤北、赣南、闽东南等地的客家人，有计划地部分迁往地广人稀的四川、粤西、广西等地，史称“西进运动”或“湖广填四川”。当时四川因战乱、天灾、疾疫等影响，人口锐减。现在四川的内江、广安、成都等 32 个县市的客家人，基本上来源于“西进运动”的迁移。有些西部欠发达地区，如钦州也实行鼓励开垦政策，为移民提供了较好的迁入条件，曾引起诱发性的迁徙。在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(1536-1539)桂南的钦州“招人耕种，不拘军余，客居及无粮人，但愿承田者悉与之”，要交税的每人给 30 亩，不用交税作为舍宅的每人 10 亩。因而，引来很多闽南、粤东以及广西博白、贵县、宾阳等地的客民前来安家落户。又如在明嘉靖年间，闽东南地区因枕山面海，土地资源少，加上倭乱猖獗，到清初顺治时期，又野蛮迁界，因而福建漳州、泉州很多客民通过海路往广东的潮汕、雷州或廉州等地迁移逃难，号称“走广”。

清康熙年间，朝廷对广西又实行招民垦荒政策，到康熙末年，桂北各地“人民渐增，开垦无遗”。在清雍正初年，川陕总督岳钟琪曾奏准“招民事例”，向进入四川、贵州和广西的外来移民提供“牛具、种子，令其开垦荒地”的优惠政策，因而也鼓励和吸引了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客民迁徙到该处落户。还有些西部地方，因居住及生产生活环境较好，也引起连锁性的迁徙。据广西灵山县旧州《张氏族谱》载，在明万历年间，从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州）到广西灵山县任营讯官的张良圣，因觉得旧州田多地广，比梅州的谋生环境好，因而退伍后即回梅州，与一帮亲友陆续前往旧州定居，到 1990 年已繁衍 16 代，共 16000 多人。这是连锁性迁徙的体现。此外，广东嘉应州人李庆云，曾是清后期龙门协水师副将，属二品官阶的武官。退休后在广西北海定居，也引来一批嘉应州的客家人来北海谋生。这也应属连锁性的迁徙。现在这批客家后代，分布在北海、博白一带，每年清明都有很多客家人，到北海李庆云将军的坟墓拜祭。

明清两朝，客家人从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迁入广西定居的日渐增多，特别是从康熙至嘉庆的 150 年间达到高峰期。据钟文典教授统计：“清顺治十八年(1661)广西全省人口共 58 万人，到了乾隆十八年(1753)，全省人口为 197.6 万人。再至乾隆五十一年(1786)，全省人口为 627.4

万人，33年间，净增人口达429.8万人左右，出现了广西人口增长的大高潮。其中当有不少是外地来的客家移民。他们成群结队向广西迁移，主要是为了易地谋生。”又据民国《钦县县志·民族志》载：到清朝“乾嘉以后，外籍迁钦者，五倍于土著”。由此可见，清乾隆、嘉庆两朝以后，外地人大量迁入，其中不少是客家人。他们大多主动迁入，而不是因战乱、天灾等原因被动迁入。

第六次大迁徙在清后期。大迁徙主要是因人多地少，多年的战乱，社会矛盾恶化，以及一些地方土客械斗需内政治理等原因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使浙、闽、粤一带传统手工业受到沉重的打击，失业民众不断增多，加上连年天灾，使粤、桂、湘3省成了当时受害最重、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。1851年1月，客家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，有2万多客家人参加了太平军。农民起义席卷18个省，时间长达十多年。为逃避连年的战乱，寻求安定的社会环境，很多客家人被迫背井离乡，成群结队逃往相对稳定的两广地区、港澳台或移民海外。1864年7月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，很多太平军为躲避清军的追捕株连，也隐姓埋名逃往相对稳定的粤桂或东南亚地区。

在向海外移民方面，从清后期至民国，粤桂两地海外移民不少，广东移民最多，其中很多是客家人。“大约在晚清至民国年间……据统计，广西在国外的华侨、华人共有260万人，仅次于广东、福建，居第三位。”这说明从晚清至民国年间，广西向海外移民不少。而上述华工出境诸县，均是有很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。粤桂客家人在海内外的迁徙中，为联络同乡情感、保护同乡利益，都在海内外建立了不少同乡会馆。据文献记载，“19世纪，广东人在新马两地建立了76个华侨会馆”。其中约于1800年，广东嘉应州人已在马来西亚的檳城建有嘉应会馆；于1805年，惠州府属的龙川、河源、紫金、和平等县，也在马六甲建有惠州会馆；而嘉应会馆和惠州会馆，都是客家人的会馆。这说明广东客家人往海内外的迁徙，时间较早，数量较多，影响也较大。在内政治理方面，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在广东居住的一些客家人，由于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不和产生械斗，为了息事宁人，开垦边远地区，清政府曾资助客家人大量迁往广东省的高州、廉州或广西的贵县、容县等欠发达地区。据有关史料反映，“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由于在此前的10余年间，开平、恩平与阳江一带的土客，因学额应考之争械斗不断，为了平息事端，是年十月朝廷派专员劝谕十数万客众他迁，发给资费白银大口八两，小口四两，派兵丁分途保护送往高、廉各府州县及广西贵、容等十一处，觅地居住谋耕”。此外，一些史料也有此类的记载，如唐志敬的《清代广西历史纪事》载：“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肇庆府土、客械斗，清廷将两万客民遣散在廉州等地安置”。

总之，南迁汉人携带的汉文化，在粤桂两地的土著居民中，历经千百年的渗透、融合和重组，很多土著居民群体都被汉化了，其中孕育出多元化的汉族客家新民系。两广客家新民系，已成为汉民族8大民系中重要的一支。它是在6次大迁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。

二、粤桂客家民系的固化，有赖于千百年来不同群体的互动、磨合与重组

中原汉族南迁的移民，在与粤桂两地土著居民长期生活中，其方言及风俗等原有的一些特性，有些被当地土著居民所同化，有些同化了当地土著居民，有些新客和老客在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生活中，相互磨合、吸收、重组有些同化与重组，历经多次反复与融合。到了清末，粤桂客家民系的相对固化，有赖于千百年来，不同族群群体的互动、磨合、融合与重组。秦汉时期，中原客家先民已进入岭南地区。从晋唐起，或因战乱或因天灾而多次辗转迁徙，大多从山西、河南，往

江西、安徽、福建迁徙，再往广东、广西辗转迁徙。两广客家的迁徙，多从粤东的梅州、粤北的韶州，往粤中的清远、河源、广州、惠州，桂东南的梧州、郁林州，粤西的高州、雷州、琼州迁徙，再进一步往广西的贺州、柳州、横州、廉州（含合浦、钦州、灵山、防城）等地迁徙。粤桂客家人，大多都是在明清时期大量迁入的。粤桂客家人，多聚族而居。客家先民的迁徙，大多是从北往南、从东往西、从平原到山区逐步推进的。岭南开发比中原较迟，广西的开发也比广东稍迟。

以上对粤桂客家迁徙路径的分析，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《广东历代移民路线及分布图》的移民走向，大体上看是相符的。客家先民辗转流徙，有些举家有些同族，他们扶老携幼，颠沛流离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披荆斩棘，跋山涉水，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。但这样的人生际遇，也造就了客家人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团结互助、勇于开拓、敬老尊贤、勤劳俭朴、百折不挠、不畏强暴等传统美德和客家精神。从粤桂客家的宗祠门联来看，粤桂客家的“根”在中原。如北海市现有客家人约60万，约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在公馆、白沙、曲樟等几个几乎纯客家人的乡镇，多以姓氏宗族集中聚居，其村落有些连绵十多里。从他们的宗祠门联来看，北海客家人主要姓氏的来历，多在山西、河南一带。如廖姓出自汝南、王姓出自太原、朱姓出自沛国、黄姓出自江夏、李姓出自陇西、陈赖两姓出自颍川等等。这充分证明，他们的历史烙印和文化渊源的“根”，都在中原。

在唐末至明中期，有大量南迁汉人集结在闽粤赣边区，并与当地的畬瑶等土著居民，长期互动融合而孕育形成新的客家群体。这新的客家群体，对两广客家民系的形成影响较大。因这支客家群体，在明末清初，以嘉应州为客家人的集散中心，后来多往两广地区扩散迁徙。粤桂客家民系，其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特征，历史上受到中原和闽粤赣桂四地土著居民的影响。就方言而言，粤桂客家话，与赣方言和闽方言，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；与中州的词语、音韵，又有着深厚的因缘。如在粤桂两地福佬话中，就能感受到有福建闽南语较大的影子。

粤桂客家人，其先辈经过六次大迁徙，经过历代新老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族群互动，互补共生，在不断碰撞、磨合、认同、融合与重组中，这支民系在粤桂两地，已形成较为强大的客家群体。在广东省，有纯客家县市17个，包括梅县、梅江、龙川、兴宁、南雄等县市；有非纯客家县市54个，包括韶关、惠州、深圳、东莞等县市，客家人多集中在粤东北地区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，有非纯客家县市47个，包括合浦、钦州、贵港、博白、玉林、容县、陆川等县市，多集中在桂东南地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02年广西的客家人有460多万，约占广西人口的10%。广西客家人数，仅次于广东、江西及福建3省。

总之，粤桂客家的形成与发展，丰富了世界客家的文化内涵。历史已证明：客家的腹地，在以广东梅州为中心的十几个县；世界客都，在广东的梅州；粤桂两地，是引领客家人走向世界的前沿基地；粤桂客家的历史烙印和文化渊源，“根”在中原。

（作者系广西诗词学会原理事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学创作部副部长、理事）